

■讲述

想起陆文夫

□南丁

陆文夫是我不时会想起的朋友。

文夫在苏州,我在郑州,相隔千里,平时难得相聚,只有在开会时才得以见面。我和他相识,就是在1956年春天的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上。那年我25岁,文夫28岁,都是刚刚学习写作的青年文学创作者。会后,都遭到命运的戏弄,我被打成右派,他被打成“探索者”反党集团分子,彼此音讯全无。

1979年秋,时隔23年之后,我们才又在第四次文代会相见。其间,中国作协召开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那天,我正坐在西苑宾馆的会场里听代表发言,同样来自河南的叶文玲走过来告诉我:“陆文夫在会场的前厅等你。”我来到前厅,与文夫相握相拥,彼此打量着脸上被岁月涂抹的沧桑。

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文艺界的第一次大团聚。因此,虽然天气寒冷,大家都被春天般的气温暖暖着,被小平同志在文代会上的《祝词》感动着。大伙喜笑颜开,将那份沧桑遮蔽。文夫也不问我的情况,也不说他自己,他只说方之。方之,我并不熟,是否在青创会上课过面,也记不清,但我读过他20世纪50年代写的短篇小说《在泉边》和复出之作《内奸》——《在泉边》清澈,《内奸》老到,我认为都是难得的上乘之作。方之也是与文夫一样,被打成“探索者”反党集团分子。文夫说,方之原来也要来参加第四次文代会的,出发前,猝然病逝。他很为方之错过了这春天的聚会叹息。这时我就捕捉到文夫面部表情的变化,眼眶也湿润着,那是他心中的痛。

《北京文学》编辑部在这次会议的间隙,召开青年作家座谈会,被邀的有当时正年轻的贾平凹、叶文玲等,也有23年前参加青创会的王蒙、邓友梅、陆文夫和我等等。就好像23年过去,我们这些人都未变老。文夫笑着说:“我都



四次文代会上,袁鹰、陆文夫、南丁合影

51岁了,还算是青年作家吗?”河南的张有德也在邀请之列,有德当年45岁,他早婚,已有了孙子,是当了爷爷的青年作家。这就像一场喜剧,大家都挺高兴的。

1980年冬,我与段荃法代表筹办中的《莽原》杂志,去参加在镇江举办的大型期刊座谈会。会后,我们有上海之行,我与荃法商量,在苏州停留一天,去看陆文夫,说说话,请他为《莽原》创刊号写个短篇。那天上午,敲响他家的门,文夫和夫人毓柔都在家中,我向文夫介绍荃法,文夫向毓柔介绍我。毓柔握住我的手问文夫:“南丁?就是写《拉车歌》的那个南丁?”这一瞬间,我有点小小的惊喜和得意。《拉车歌》是我1978年1月中旬写的1.5万余字的短篇小说,发表在当年《河南文艺》的3月号上。我惊喜的是,这本地方出版的文学刊物,当时仍在苏北农村村落尚未回苏州的文夫夫妇竟能看到。更意外的是,毓柔非但看了,而且还记住了。毓柔是《苏州日报》的资深编辑。顺便说

一句,这篇小说的插图作者是河南画家李伯安,后因大型油画组画《走出喀颜巴拉》为人们所知,但却英年早逝。

大家坐下,文夫、荃法和三人相对,吸着烟,说说话。依稀记得,文夫充满期待地问,你们河南文学界怎么没有声音?其时,张有德的《辣椒》已获得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可能声音稍嫌微弱。文夫又说到他对当时一些文学作品的看法,我记得他说过的一句话:“我们不能搞自杀文学呀。”对于文夫此话,我当时不解,至今也未理得十分清楚。中午,文夫让我们留下来吃饭,毓柔做的苏州味的红烧肉味道甚好,大家还喝了点小酒。饭后,文夫陪我们去找了家宾馆住下,翌日中午又到宾馆陪我们吃饭并送行。约文夫写的稿子,他如约寄来,即短篇小说《打羊》,发在1981年5月《莽原》创刊号上。

1985年末,我在河南省小说创作评论工作座谈会上作了题为《继续推进小说创作的好势头》的发言,随后据此写成一篇文章《喧闹的1985》,回顾了河南1985年小说创作的喧闹景象。我在文中作出判断,河南作家群趋于形成,并回应了1980年冬的文夫之问:“5年前关切地问及你们河南怎么没有声音的,今年初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文夫兄,听到这喧闹,当也会感到慰藉的吧。”

1988年全国第五次文代会时,在人民大会堂的前厅碰到文夫,感到他比1980年时瘦了些,好像有些疲惫,未能多叙叙,又遇到袁鹰,我们三人一起照了张合影。

2001年冬,全国第七次文代会、第六次作代会同时召开,但在不同的会场。我在文代会这边,那次作代会换届,文夫、张锬诸位皆因年事已高退出。闭幕那天晚上,我从也在作代会上的女儿何向阳处获得文夫、张锬的房间里

话,分别与他们通了话。文夫说,他近年身体欠佳,烟已戒,酒也少喝。我感到他的情绪仿佛也受到身体的影响,不太高昂。

2002年初,向阳和一批作家评论家因《苏州杂志》之约有一次江南之行,《苏州杂志》正是文夫主编的,我让她为文夫捎去我的随笔集《水印》。向阳回来时捎来文夫送我的长篇小说《人之窝》。向阳说,李敬泽、徐坤等人在范小青的陪同下专程去拜访了陆文夫。陆文夫很高兴,谈兴甚浓,晚间吃饭,饶有兴味地说起当年自己如何被称为美男子等等,还谈及在场的潘向黎、何向阳的爸爸,说都是他的朋友,说他们年轻时也都是美男子,云云。我一边听,一边笑,心里为他高兴,文夫的心态不错,挺年轻的,是否身体也好了一些?

2003年春,鲁彦周邀些朋友作皖南行,也邀了文夫,文夫因身体原因未去。我就未能与他相聚。

2004年春,我写信请他来郑州作一次讲座,借此见见面说说话。他回信说,仍因身体不好,不能前来。

《莽原》杂志辟有“当代名篇聚焦”专栏,2005年夏,李静宜约我与向阳合作,推荐一篇,我们就推荐了陆文夫的《小巷深处》。我作点评,向阳写了篇评论文章,一起发表在《莽原》2005年第5期上。我在点评后记中说:“品评尚未做完,就传来文夫辞世的噩耗。文夫兄,这也算是对你的一点纪念吧。《小巷深处》是文夫的名作,我至今也不明白,这么一篇歌颂善良、歌颂美好、歌颂爱情、歌颂诚实的纯真文字,当年为何要遭到批判?”向阳的评论文章题为《运河为枕》,文章的结尾,她引用了陆文夫在《老苏州》中的文字:“苏州,这古老的城市,现在是熟睡了,她安静地躺在运河的怀抱里,像银灰色河床中的一朵睡莲。”然后,她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场熟睡,以完工我们的终章。但是能安静地躺在运河怀抱里,生前与一座城市共荣,身后化为河床中一朵睡莲的人,在这个世上并不很多。陆文夫,以他的德行,成为这不多人中的一个。”

文夫已远行10年,不时想起他的身影,涂抹以上文字,释我思念情怀。

■人物

古都北京,夏末秋初,景色总是特别优美。这时,天空显得极为高远,蔚蓝而辽阔。此时的燕园,也正处于一一年之中最美丽的时刻:古香古色的亭台楼阁,以及蜿蜒曲折的小径,在一片蓝天的映衬之下,显得轮廓分外鲜明;在苍翠的树木及绿茸茸的草皮中间,点缀着迟开的花朵。

1926年,正是在这样一个明媚的季节里,女作家冰心从美国留学归来,回到了阔别三年的美丽燕园。这时的她,已不再是那个才思敏捷、温柔恬静的女学生,而是一名严肃端庄、为人师表的助教了。但她仍然像三年前离开母校时那样——个子瘦小,聪慧的目光中流露出纯洁的稚气。

冰心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就是《燕大季刊》编辑部国文组的编辑,还是全国知名的青年女作家。她本科毕业时,获得了“金钥匙”奖,以及留学的奖金。当她留学归来,被燕京大学同学会推举为执委常务委员,成为燕大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中的校友代表。《燕大月刊》编辑部在聘请一些名流学者当顾问时,把年轻的冰心聘为诗歌顾问。《燕京学报》将其聘为刊物的编委。1927年出版的创刊号上,第一篇是大学者王国维的文章,第二篇则是冰心的毕业论文《元代的戏曲》。

冰心到燕京大学教书以后,她的父亲谢葆璋随即南下,迁回了上海,并在那里定居了。他把新家定在徐汇区,是一座三层小楼房。多年后,冰心回忆说:我只记得,父母居住在上海市的徐汇区,属于当时的法租界。父亲的房子与当时的非租界区只隔着一条河,但是那座宅子所处的具体路名与门牌号码,已经记不清楚了。

于是,就只留下冰心一个人在北京,住在燕园的朗润园里。这座小园别有洞天,曲径通幽,安静美丽,很合冰心的口味。虽然她仍是想念南方的双亲和分散在各地求学的弟弟们,还有那位远在大洋彼岸的青年学者,也是她心目中的恋人——吴文藻。但是,她能够经受独立生活的锻炼。

冰心一生都具有谦逊的美德,哪怕到了晚年,她仍然自谦地说:“我个人是个不学无术的人,没有什么‘学’可‘讲’。‘不学’,就是没有学问,如果大家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那是得不到的;‘无术’,就是没有什么技术,如果大家希望听我讲完以后,就能知道怎样写作,而且写得很好,那也是会失望的。”

其实,她在26岁时就已经是一位很有修养的青年学者了。她生性严肃、恬淡,没有课的时候,总是一个人坐在书斋里读书、写作。清晨或傍晚,她喜欢散步,沿着弯弯曲曲的柏油小路,流连于湖畔,在绿草地上行走,或是登上低低的小丘,在亭子上的矮凳上小憩。她喜欢一边踱步或小憩,一边细细地思索。

冰心在幽雅的校园中过着最典型的学者生活,从表面上看,一切都是十分美满的。但在燕京大学高高的院墙外,一切却是很不平静的。不久,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阻挠中国军队在华夏大地上布防,炮轰了天津大沽。面对这些侵略行径,爱国的北京学生在3月18日这一天,先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群众大会,接着又整队游行,跑到东城铁狮子胡同,向政府当局请愿,并向日本侵略者表示抗议。不料,段祺瑞竟命令自己的卫队向青年学生开枪,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与此同时,各派封建军阀之间的混战也愈演愈烈。1926年4月,直、鲁两系军阀,趁段祺瑞被迫辞职的时机,进逼北京。5月,吴佩孚企图组阁,遭到了奉系军阀的反对。

北伐战争也已经开始,湖北、江西、河南等地已是战火纷飞。10月,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举行了武装起义。之后,无锡、苏州、杭州等地的产业工人与手工业工人,也相继举行了罢工。另外,因为英国军舰炮击了重庆万县,使4000多名无辜百姓死在炮火之中,“反英运动”爆发。

这些接二连三发生的事件,越过了燕京大学高高的院墙,把火与血的残酷现实,摆在了如冰心这样的知识分子面前。这种情景和世态,必然会影响到冰心的思绪。她后来说,1926年回国以后,直至1929年,简直没有写出一个字。如果写过一点文字,恐怕只是一两首诗,如《我爱,归来吧,我爱》《往事集·自序》等。缘故是因为,那时忙于课务,家又远在上海,假期和空下来的时间,差不多都用在南下北上之中,以及和吴文藻通信里。

其实,住在燕园中的冰心,仍在默默地思索。她过去一贯歌颂童心、母爱和大自然,虽然也有过关于“爱”还是“憎”的思索和怅惘,不过那还只是有些踌躇,有些疑惑。随着世事的变化、年龄的增长和思想的成熟,冰心的思考也就更加深刻了。个人生活与家庭生活都适宜、幸福的冰心,却又时时感到内心充满了“虚空与寂静”、“迷惘与糊涂”。这些“虚空与寂静”、“迷惘与糊涂”是什么造成的呢?或许,都是社会环境所造成的。

燕园中的冰心

□王东山

两只蝴蝶

苏沧桑/图文

如果生命是一条河流,甲午重阳,我从浑浊的中游逆流而上,回到了娘家的院子,最清澈的生命源头。

母亲将自己酿的米酒热好,把刚采做的桂花糖融到了酒里,满上了三盅花瓷酒杯,摆到了桂花树下的小桌上。阳光从桂花树叶间漏下来,在米色桌布上微微移动,让我在恍惚之间回到童年。那时,父母还年轻,我还如这阳光般烂漫。

三杯酒静立在明明暗暗的光晕里,琥珀般静默。一阵风吹过,桂花落了下来,与融在酒里的熟桂花相遇。我听到了两个生命的叮咚脆响,如同我们常常与祖先在梦里相遇。

吃饭时,父亲撑开一把红伞将它倒挂在桂花树枝上,说,这样桂花就不会掉碗里了。

桂花落在碗里,是一件诗意的事,可是娘家院子里和我同龄的桂花树太大了,一阵风,一阵花雨,满地满头满桌都是了。可是,搬到房间里吃,又是多么浪费,所以,是要撑着伞吃饭的。

这是2014年重阳节,我小病痊愈后回老家小住。这场病虽有惊无险,却着实让我和家人受了一番惊吓,也惊讶什么才是重要的,什么是该放下的。这个季节,我已多年没有回过老家,多年没有陪父母过重阳节、过生日,也多年没有看到娘家院子里的桂花盛开。忙,总是忙。此刻,我们围坐在树下,喝酒,吃母亲烧的海鲜面。母亲忙完,从厨房出来,一坐下便把自己碗里的浇头都夹到我碗里,堆得小山一样。父亲说,这个蟹是熟人摊上买的,野生的,那个虾是硬壳的,鲜甜,这个鱼丸是你最爱吃的……我如

一个孩子一样被他们宠溺。

三十多年前,在很多人不解的目光里,父亲携全家从日渐喧闹的楚门镇南门街搬来冷清得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山后浦村,并为自己亲手新建的家园作了一副对联:依金山千朵红花似锦艳,面银市万家灯火如画妍。横批:山乡乐园。此后多年,娘家的大门上就总是这副对联。一家五口常坐在阳台上联诗,母亲起过一句“月移南窗影”。

说话之间,两只蝴蝶来了。它们总来,但似乎并不喜欢桂花树,更喜欢从墙外伸进来的一棵臭泡桐,在那些淡紫色的花朵上忽高忽低地翻飞。一只黑白相间,红色的喙,一只黑蓝相间,翅膀斑纹冷艳。这种蝴蝶,我从小认识,我们叫它们梁山伯祝英台,永远是这样的两只,而不会是三只或者四只。它们会忽然飞进来,在草地上低空盘旋,又绕着院子,依次在石榴花、桂花和月季上停留,形影相随,不知道是觅食,还是恋爱,或是交配,却好像故意给我们看,又躲着不让我拍。

忽然想,昨晚它们在哪儿?也和我一样酣睡在娘家的院子里?它们有家吗?蝴蝶的生命很短,今天这两只,是昨天前天的那两只吗?明天、后天的两只,会是今天这两只吗?

时光是个身怀绝技的贼,会偷一些好东西回来,却也会让一些好东西消逝,反复无常,我爱它,也怕它。

北京朋友在微信里问,这两只蝴蝶的照片是PS的吗?他大概无法相信天还能这么蓝,蝴蝶的花纹能如此清晰可辨。

我说,是真的。你要相信,还有真的。



朋友来电,传我去河南。我不解,时已寒秋,上河南看红叶吗?老弟并不释疑,却纠正我语病,北京到河南,为“下”,而非“上”。说来倒是,北京动身,朝南走,俗称南下。除去地理的原因,还有一种身份意识——一些北京人总是自觉优越,身价不凡。的确,在北京,说不定哪日清晨黄昏,哪条偏街小巷,哪家常小馆,不期而遇,就能与达官显贵打个照面儿。而身居外省的人们,自是没有这等事。然上天公平,酸甜苦辣,人人有份。话说北京的人气实在太旺,无论是二环、三环,还是四环、五环,常成黑压压的车场。出差去京,有时困于静止的出租车上,计程表针匀速前行,而路边公交站前后,布满无希望亦无绝望的脸。天再灰暗点儿,风再冰凉点儿,便禁不住对首善之区的良民滋生悲悯的情怀。

请教河南的朋友,方知天津赴中原,如欲图快,眼下还躲不开北京。必须先坐高铁到北京南站,再换两番地铁或打的至西客站。因系同好间的呼朋引类,遂豁了出去,应命上路。略去前半程的折腾不表,自西客站出发,竟出奇惬意,骑着高铁3小时,扭身“上”了云台山。

依寻常想象,接下去纸上文字当如是推进:远古时代,地壳起伏,莽莽太行,朝南延伸,倏忽间扭动中止,裹足不前。大片群山“定居”之处,

■行走

北京往南

□任美康

正是今日河南焦作云台山。登高北望,山山不断,岭岭相连;转身南眺,黄河逶迤,沃野无边。

上述语句未及付诸笔墨,导游女郎已高声诵出:“云台山举世闻名,如今已是全球首批世界地质公园、国家首批5A级旅游景区、国家水利风景名胜、国家级猕猴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自然遗产、国家……”聆听到此,境界突地升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踏进国家公园,一言一行,理当饱含责任感,为保护国家的自然风景、森林资源、珍奇猕猴尽绵薄之力。本是消遣逍遥的游山玩水,却一下子变得如此庄重、严肃。由此可见,人一旦“正经”起来,稍不留神,便会滑入小圈大做。

面对硕大的云台山地貌模型,讲解员的介绍

言简意赅,既有整体轮廓的提纲挈领,又有要点突出的如数家珍。尤其是介绍者手持教学棍,比不少类似场合的电光比画,更有实地的触感和亲切。何处是落差314米的亚洲第一高瀑老潭沟,何处是三步一泉、五步一瀑、十步一潭的小寨沟,何处是日出日落时阴阳参半的子房湖,何处是唐代诗人王维“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的茱萸峰,何处是魏晋时期“竹林七贤”的隐居地,何处是汉献帝刘协的陵寝园,何处是唐代药王孙思邈的炼丹洞,何处是耸立悬崖的国家级文物孝女、瑞云两佛塔……她都详细道来。目光一一掠过,心中泛起层层波澜。因长于西南山中,我对山水的奇异,通常难觉奇异。但我却惊奇于南北分界的云台山,

何以竟有故乡的景致。随即我亦成了导游,内行般点拨同伴瀑多潭众、瀑急潭深的裙带关系。

面对活脱脱一座宝山,人人惊奇,但个个明白,纵使你游兴旺盛、体力可支、时间有余,均无非是做皮毛的掠影。讲解员似乎也在拿捏火候,指东说西,就是不言及我们的旅程。

导游将一干人带至一座桥前,说道:“今日景点红石峡已到,从此刻开始,不再上山,而是下山。”轻烟缭绕中,眼前出现一条由深棕色岩石组合而成的峡谷。忽深忽浅、忽宽忽窄的山峡,景象似隐若现。你甚至刚迈出三步五步,眼前已变幻出新奇之象。道路陡峭,但每步石阶皆平展。路旁的钢索,崖边的铁栏,通通裹缠了隔暑隔寒的绒布。同伴中有位心脏不适,过桥前就曾高声鼓励自己,但似乎更像吓唬他人。一路沿着山沟下来,穿过重重山涧,跨过道道栈道,却面容正常,喘气均匀。经旁人故意提醒,“病号”一脸侥幸:“咦,奇了怪了,竟把心脏这事忘了。”峡中有山,一忽儿高地,一忽儿丘陵;峡中有水,一忽儿飞流,一忽儿静湍;峡中有树,一忽儿矮丛,一忽儿高林。绿草萋萋,是寒冬腊月都不枯的;青苔淋漓,是北方山中极难见的;石桥弯弯,是江南小镇方才有有的;红石烁烁,是赏石癖君不忍去的。一汪稍大些的潭中,缓缓划来

一叶扁舟。艄公头戴斗笠,身着土黄衣裤,竟是扮作古时渔夫的清洁工。游人纷纷驻足,投以静默的神往。我亦倚栏,有些恍惚。渔夫腕上表盘晶莹剔透一闪,让人始觉今朝乃何年。

斯峡如此磅礴,却又高度浓缩。南北深约1500米,俗称三里;东西最窄处仅数米,旧称丈余;最宽处30多米,至多九丈许。闭目盘点,数十年间,国门内外,我也算见过一些稀奇,但眼前真山真水的盆景,或曰盆景式的真山真水,实为平生初遇。

自50岁起,我出门不带相机,就怕影像示人,有碍观瞻。碰上别人要求合照,权当充任道具,从不奢望分手之后,能飘回一张半张。这回河南归来,抽暇翻阅云台山的书刊。竟无一例外,所有领衔位置,都是红石峡的玉照。自己虽没留影,但我心诚,过目难忘,已将云台装进脑海。

登山那天,星期一,按说不会有双休日和节假日的人声鼎沸。幸福的北京人,恰逢国际会议,喜迎长假,纷纷出游,仅焦作一地,便每日有专列输送。北京往南,就上云台山,似乎已成首选。纯正的京腔,半生不熟的京片子,绕耳不绝。端的是,云台勾人腮帮处,多为京城休闲客。